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塞疆 著

阻力

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阻力

塞疆 著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阻力/塞疆著.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80169 - 710 - 3

I. 阻... II. 塞...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②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589 号

阻力

——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塞疆 著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 24 号 青蓝大厦东办公区 11 层
邮政编码	100007
电 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68320498(编辑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4
字 数	188 千字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书 号	ISBN 7 - 80169 - 710 - 3/F·3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中国步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这是吴敬琏——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历史方向感的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 20 周年时引用的狄更斯的一段感言。

选择决定命运。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走到今天，确实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转折的时刻，一个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相互默契、良性互动、共同合作的时刻。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伟大的事业。说其复杂，是因为它实际上集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政党新生、政治发展、对外开放于一身，“五维一体”，在五维空间中求稳定、求秩序、求平衡，这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没有任何先例可寻。

说其伟大，是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现代化决战。决战成功，就意味着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就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成为现实，我们对上可以告慰先辈英灵，对下可以泽被后世子孙。也许，它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只有在过了几代人之后才能被真正看清楚。

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经济连年持续高速增长，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创新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绝大多



数人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然而,毋庸讳言,我们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麻烦和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尤其要注意的是,许多过去我们习惯使用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手段目前已经不可持续,面临着即将“失灵”的困境:

——各层级政府的隐性债务深不见底,一些地区的财政危机频频爆发,一个统一、清晰、透明的公共财政框架迟迟未能建立。

——国有银行的改革前途未卜,民营银行的组建好像还是遥遥无期,这不但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且使国家始终摆脱不了发生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社会安全网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下岗失业工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传统的意识形态创新之路基本上走到尽头,改弦更张迫在眉睫。

——国家文化重建的目标和方向一直不明朗,国内不同人群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初露端倪。

——官员腐败现象逐渐深化,稍不注意就可能呈现糜烂之势,人民对此早已是深恶痛绝。

——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再无根本性的举措出台,解决农村问题的治本之道仍然缺乏。

——和台独的斗争仍处于“胶着”状态,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上台不择手段,大陆对台政策已接近底线,被迫一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一直缺乏大智慧,世界在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角力中迷失了方向,在这个纷繁复杂、敌友难分的世界上,中国急需找到自己准确的国际定位。

这确实是一个考验国人智慧的时代,国家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但需要在朝者的智慧,同时也需要在野者的智慧;不但





需要社会精英的智慧,同时也需要平民大众的智慧。

怀着对人民幸福的真诚追求,怀着对国家复兴的热切渴望,怀着对民族未来的美好向往,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国家未来应该的走向,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虽然“GDP崇拜”不对,经济增长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经济不增长或低增长却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两个基本点——一方面,进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革新;另一方面,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力度,舒缓社会矛盾,解除经济危机隐患,提高遏制、打击台独的综合能力。历史的结局从来都不是由一个方向的逻辑决定的,必须绝对避免最坏的情况在中国出现。

只有人民的中国才会是青春的中国,只有青春的中国才会是光明的中国!



目 录

前言:中国步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1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摇不得	1
“铁三角”的掣肘	2
“后发综合症”的泛滥	10
二、意识形态革新路径之变	23
“实践标准”功成身退	23
“与时俱进”破土而出	28
“第三条道路”的启示	34
三、儒家文化的复兴	41
道德滑坡的背后	41
“文明的冲突”在国内	45
未来中国的“软力量”	50
四、对腐败形成高压态势	55
经济危机为何会导致印尼政府垮台	55
百年大计 反腐为本	59
绕不过去的“大制度”	70



五、破解“铁三角”之一：国有银行	79
比股市更严重的问题	79
国有银行的生死劫	85
民营银行的事“拖”下去不是办法	98
六、破解“铁三角”之二：国有财政	105
财政负担的无底洞	105
脱胎换骨的财政再造	112
美国“进步时代”的经验	120
七、破解“铁三角”之三：国有企业	127
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127
发展中小企业的“大战略”	140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146
八、走出“棋盘困局”	153
农村究竟碰到了什么问题	156
村民自治：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169
本不该难产的农民协会	178
九、台独的麻烦	185
“公投”敲响的警钟	185
明明白白的三方对弈	188



十、一个迷失方向的世界	193
历史时代的大变迁	193
走到十字路口的美国	196
中国外交的“大棋局”	201
结束语：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感	211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摇不得

如果说在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的话,那么,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意义就尤其明显。社会的稳定,下岗失业工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农民收入的维持和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财政赤字的减少,经济危机隐患的解除,遏制“台独”能力的提高,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言权的增大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国家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不公平性受到了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但谁也无法否认,如果经济不增长或低增长会给社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在经济高增长中逐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疑难问题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 9.4% 的速度增长,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确实是举世瞩目。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纷纷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时,作为中国自身,也许不应该是对“风景这边独好”的陶醉,而应该是对国家经济仔细审视后的冷静、清醒和自觉。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这些年来之所以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锦囊妙计”,而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在目前中国的话语平台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发展”。所谓“改革”,就意味着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搞错了”,由“错”到“对”的转变,也就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也就意味着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谓“发展”就意味着我们“落后了”,落后虽然不是好事,但也有“落后的优势”,即由于有一些发达国家在前面“蹉路”,我们就用不着事事都去摸索、试验、创新,而





是可奉行“拿来主义”，把别人费了半天劲才搞出来的“新东西”，有条件“拿来”的统统“拿来”，同时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走一些它们曾经走过的弯路，也就是说“发展”也意味着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就是以“改革”和“发展”为宏观大背景的。

然而，高速度并不能掩饰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本来还可以更快。概而言之，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铁三角”的掣肘，二是“后发综合症”的泛滥。

“铁三角”的掣肘

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一些应该改的地方至今仍然没有改，最起码是没有“大改”、“实质性地改”，这就是国家预算内财政、预算外财政、制度外财政三重财政并存的情况尚未改变，国家财政收支非常不透明，公共财政的框架还远没有建立；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民营银行的组建好像还是遥遥无期；中央垄断企业的改革还基本上停留在“内部分家”、“兄弟竞争”的状态，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个领域的问题搅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盘根错节，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简直形成了一个“铁三角”，这对资源有效配置和国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的说法，就是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好比是一根管子拴着的三个瓶子，将三个瓶子串在一起的好处是，只要有一个瓶子有水，其他两个瓶子就有水；而坏处则是，只要有一个瓶子漏水，则三个瓶子的水都会漏光。现在的状况是，三个瓶子都正在漏水，如果这种趋



势长期得不到扭转,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了,弄得不好还会引发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具体地说,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获得税收和利润收入;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国有企业注资,用于增加资本金,搞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弥补经营亏损和政策性亏损;国家财政出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减轻负担;国家财政出资安置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其发放基本生活费,以减轻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压力;国有银行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巨额国债;国有银行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正常存贷款业务,获得利差收入;国有银行承担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业务;对国有企业欠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采取债转股或坏账冲销的方式予以解决;通过利率调整等手段,在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之间转移利润,同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发生变化;通过税率调整和其他政策调整,改变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状况等。

“铁三角”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资本资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为紧缺的资源的误配置上。

2000年2月26日,早春的北京乍暖还寒,在城东的国贸饭店,一场精英云集、气氛热烈的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这次研讨会是专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而举行的。吴敬琏1930年生于江苏南京,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政策研究工作。在一次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潘园的采访时,他曾经感慨地说:“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吴敬琏对中国的改革事业投注了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不辞劳苦,参与了许多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评估工作,他的名字也和“改革”两个字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这次研讨会的话题当然更是离不开“改革”。会议伊始,吴敬琏就作了“中国改革回顾与展望”的主题讲演。他在回顾了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话锋一转,说了一句发聋振聩的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

吴敬琏解释说,“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在,虽然国有经济基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大致上只有三分之一,但是从经济资源的占有来看,国有经济还是占了主要的地位,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又很不能令人满意,还远不能说市场经济在这部分资源的配置中起了基础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就使得耗用了三分之二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三分之一。

“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吴敬琏强调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吴敬琏认为:“我想重要原因有一部分人在原有的国有经济里面有非常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在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里面有重大的利益。于是,要改革和改组国有经济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他接着说:“我最近在匈牙利呆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匈牙利同行们,包括 80 年代我们很熟悉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们,很沉痛地对我说到他们的教训。为什么他们的改革到了 80 年代进行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人在旧体制的国有经济中有重大的利益,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同时用给优惠政策、发补贴、放贷款等多种方法支持、扶植国有企业,再生产党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在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就试图要对国有经济发动邓小平所说的“摸老虎屁股”的攻坚战。而





且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就此做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进行得很不顺利。从这里看, 国有经济改革的困难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 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十五大”决定了要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建立今后长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 应该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贯彻落实。这两年来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 就是国有部门有一种忽视改革和改组, 热衷于“跑部钱进”的潮流。为了克服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 财政投资作为启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是必要的。但是, 如果将它变成一种动员民间资源, 救助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 就会引起微观上和宏观上的一系列消极后果。首先, 强化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 不可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而且长期使用这样的办法, 会过分加重财政的负担, 威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 如果国有企业热衷于取得国家注入的资源而忽视自身的改组和改革, 其结果就会是复制旧体制, 加强旧体制。

“铁三角”的问题久拖不决, 不但会造成资源浪费和资源误配置, 影响经济增长, 而且更为严重的, 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使国家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这一点早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的 1998 年吴敬琏就注意到了。他在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汪丁丁博士进行的一次对话中说: “此次东亚危机之后, 国内出现了一种看法, 以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危机, 主要得益于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比较慢, 把最难的改革放到了后面。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把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改革往后拖, 只是把问题沉淀下来, 这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 必须认真对待。”

就在这次对话中, 吴敬琏还谈到: 不管怎么样, 中国再回到计划经济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是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 可能会发展成 crony capitalism, 就像印尼那样。crony capitalism 这个东



亚经济危机发生后流行起来的词儿被译为“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其实这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前东德，好像都没有躲过这种命运。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

在 2001 年《读书》杂志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以及 2003 年 10 月 30 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吴敬琏又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他指出，马克思和列宁曾说过，德国和俄国既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更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也可以说是受市场经济不发达之苦远甚于市场经济发达之苦。这和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原则上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暴露出种种弊端，需要寻找适当的途径来加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由此提出的背景，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处理的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得多。

正因为旧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便很容易走向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曾经一度出现过好的势头，可是不久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权急速地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把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推翻了当时看起来十分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按照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计划，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中的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但是恢复时期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否定了党的七大确定的纲领，以前俄国为师，急速转向在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实行集



权的计划经济,以为采用集中计划动员和配置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殊不知集权计划经济不但由于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人民生活水平在 1957 ~ 1977 年长达 20 年的时期中几乎没有什么提高;而且由于抑制了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当家作主权利的发挥,官僚主义和腐败也逐步滋生。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竟然落到了崩溃的边沿,从而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问题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也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 *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有些人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发生这种情况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后进国家通常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吴敬琏由此做出了这样的警告:“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振荡,就很难退出了。”

在那场著名的股市大辩论中,吴敬琏曾对自己的立场作过这样的表白:“老实说,我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讲话,有太



多的‘平民意识’，看做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荣誉。我理解所谓平民意识，就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而专业精神则除了专业知识、能力、责任之外，也包含着特定的信念和道德。依我看，这种信念和道德恰恰同我所学习的经济学理论和秉持的科学精神是统一的。”这不应理解为吴敬琏的“谦辞”，而是真正的“实话实说”。

对东亚经济危机的体制根源做出深刻反思的，还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樊纲。这位从1988年发表《灰市场理论》一文算起，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活跃了将近20年的学者对“体制问题”的定义非常明确，主要就是指“在政府、企业、银行（包括金融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

樊纲指出，所谓“东亚经济模式”历来是东南亚国家学习的榜样，而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本身就包括了本来属于“东亚经济”范畴的韩国；同时作为“东亚模式”的带头人日本也没有走出低谷，有些问题还在进一步暴露。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东亚模式”的良好机会。

他接着指出，所谓“东亚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这次东南亚危机之后人们谈论较多的也是这一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于已有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发展中国家不必事事都由市场通过“试错”的方式摸索成功之路，在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上，特别是在早期阶段上，运用政府力量进行资源配置，以期快速增长，有其合理性，日本“经济企划厅”对私人部门提供信息，进行沟通与协调的做法，不失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一个成功经验（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计划指导”或“产业政策”，而是信息的沟通与协调）。但是，如果“政府主导”意味着韩国式的“政府保护”，是政府指示银行给企业贷款，企业可以凭借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关系进行扩张，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则必然潜伏下日后的危机。

“政府保护下的企业和银行”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即使企业和银

